

DOI 编码: 10.3969/j.issn.1672-884x.2014.06.001

# 哲学何以在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视角

韩巍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管理学报》曾相继发表过4篇讨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论文。在简要评述上述4位学者在“问题意识”、“立场/主张”、“研究取向”上的异同后,进一步讨论了“哲学在场”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关系。然后,结合自身哲学观形成的简要历程,认为“西方哲学在场”足以支持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当下的挑战不在于是否要创建基于“中国文化-中国传统哲学”的新范式,而是如何改善研究者的态度、接近事实以及提升研究者的智慧。

**关键词:**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哲学;在场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84X(2014)06-0781-07

## Presence of Philosophy: A Perspective of Indigenous Research on Chinese Management

HAN Wei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Recently, four paper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on the indigenous research on Chinese management (IRC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culture (CTPC). This paper makes a brief comment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sense of problem, the standpoints, and the research approaches in these papers and interprets the relation of the presence of philosophy and IRCM combing with a reflective visit on the authors' evolving philosophical viewpoint in management research. As a result, the author argues we would rather change our attitude, access to realities, and improve our intelligence than create new paradigm from CTPC.

**Key words:** indigenous research on Chinese management; philosophy; presence

### 1 研究背景

一场发生在网络世界,涉及四大洲华人学者,针对“中国传统思想/哲学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热烈讨论,终于借由《管理学报》的特色栏目——“管理学在中国”转化成为了4篇正式的学术论文。分别是黄光国<sup>[1]</sup>的《“主/客对立”与“天人合一”:管理研究中的后现代智慧》、吕力<sup>[2]</sup>的《易学管理理论与管理学中国学派:基于管理与环境的视角》、李平<sup>[3]</sup>的《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与中国传统哲学》、李鑫<sup>[4]</sup>的《中国传统哲学与本土管理研究:讨论与反思》。台湾学者黄光国致力于“心理学本土化运动”30余载,对“科学哲学”也颇有研究,相信他的声音更容易引起大陆管理学者的关注。而同在丹麦哥本哈

根商学院任教的李平、李鑫间的“观点对撞”,则又一次彰显了《管理学报》对于学术共同体责任的那份担当。

围绕这场讨论笔者初步的印象是,如果大家对于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把握比较相近,讨论应该更加聚焦、深入;如果大家能直面西方管理学界、中国管理学界的困惑/反思(包括更多了解港台和大陆已有的相关研究),以及中国管理实践中的诸多问题,讨论的意义则应该更大。更为重要的是激烈辩论的各方都应尽可能克制自己或许已经意识形态化的“偏见”。

近10多年来,笔者一直对“科学哲学(方法论、认识论)”和“管理本土研究”保持着浓厚兴趣,也相继发表过一系列文章(如文献[5~7])。受上述学者4篇论文的启发,笔者希望就“哲

收稿日期:2013-12-2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重点项目(71032002,71232014)

学”与“本土管理研究”的关系与大家进行深入交流。

## 2 4 篇论文的简要评述

与其他3位学者相比,黄光国在《“主/客对立”与“天人合一”:管理研究中的后现代智慧》一文中展现的问题意识更加宏大,将这场讨论归于“自主社会科学传统”的根本问题,突显了华人学者对于整个“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旨趣。尽管他用一定篇幅来讨论“阴阳、悟道、沉思/冥思”等中国传统哲学概念,但其基本立场和研究取向则比较鲜明,即认为要“了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以此为基础,建构本土社会科学微世界”,主张采纳“多重典范(即范式)”,走出“典范移植的困境”。笔者在思考中国本土管理问题上很早就受惠于黄光国的研究,其撰写的《社会科学理路》一书也是华人社会科学领域一本优秀的科学哲学简明读本<sup>[8]</sup>。在长达30年的“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研究中,黄光国走过一条“典范转换-共融”的探索之路。近来他倾向以“建构实在论”为主要典范,在中国本土社会心理研究上已有丰硕成果<sup>[9]</sup>。在近期的交流中,得知黄光国对“批判实在论”也比较关注,应引起大陆管理学界的重视。

黄光国教授在文中以“共犯结构”的严厉措辞检讨自己在《组织研究实证方法》一书<sup>[10]</sup>中对于实证研究(positivist research)、实证研究(empirical research),即经验研究在辨析上的“疏失”,希望引起大陆管理学界的关注。

李平的《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与中国传统哲学》一文则将这场讨论归结为“如何有效地开展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特别是关于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意义及内容”。他开宗明义阐明立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必须与中国传统哲学紧密结合,必须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传统哲学之中。”李平反对以西方哲学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唯一依据,也不认为只靠中国传统哲学就能做好这项研究。他倾向于选择以中国传统哲学(我)为主的“不对称”融合策略。

李平对本土管理研究的不足提出3点诊断:①缺乏本土理论的建构;②缺乏与本土哲学的衔接;③缺乏与西方哲学及理论的对话。李平长期求学和工作于海外,却对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有一份深切的眷恋,提醒本土管理研究者加强传统哲学(文化)学习之必要。通观李平的文章,比较认同他对阴阳思维的整体性、动态性与对立统一性3个维度的解读。在没有阴阳

平衡的意识下,或许也能领悟到管理研究——动态、整体、情境互动的必要,并成为研究中国本土领导的基本立场<sup>[11]</sup>。

每个学者都有特定的表达习惯,李平既然意在分享其学术立场,则似无深究的必要。因为立场关乎信仰,留给事实和逻辑的空间有限。李平主张“阴阳平衡”认识论,在大力宣扬“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概念时,也应该注意到那些俯拾皆是不那么和谐的论证。例如,朱亚宗<sup>[12]</sup>的《阴阳思维模式与中国古代科学》、陈炎<sup>[13]</sup>的《儒家与道家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制约:兼答“李约瑟难题”》,都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恰恰不同程度地制约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基于此,也就不难理解后来李鑫的激烈批评。

吕力的《易学管理理论与管理学中国学派:基于管理与环境的视角》一文也以这场讨论为背景,是对“中国本土管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响应。但其目的却不在此,而是对“易经管理学”的重新发现和阐释。他认为“周易是迄今为止将环境的‘复杂性’和‘可认识性’结合得最好的理论之一”。“建立一种‘完全区别于西方管理学的理论架构’的中国本土管理学意味着一种范式的根本变化,且这种变化建立在中国文化基础之上。”笔者试图理解吕力的这一尝试,但难以识别重新诠释的这套理论与现实经验间的明显关联。

吕力在这场争辩中所持的立场以及发表的评论似乎有些含混。于“中国文化为基础-根本变化的范式-完全有别于西方管理学的理论架构”的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路径,他的看法是“虽然无法从理论上排除这种设想,但现阶段这种设想实现的几率微乎其微。况且,中国本土管理学断然否定不存在一种全人类可以共同使用的普适理论体系”可能也是站不住脚的。吕力认为,“中西互释是建立、传播和发展中国管理学术的最可靠途径,从独特性与共通性而言,中西互释是建立管理学中国学派、发展中国管理学术的唯一途径”。但他却忽略了正是在“如何互释”上李平、李鑫、黄光国间存在的显著差异。在笔者看来,这3篇文章作者包括被黄光国、吕力先后提及的大陆学者章凯的观点可谓相去甚远,可以说构成了一个从中国传统哲学“主导说”、“有益说”,到“无用说”的谱系(李平-黄光国-李鑫-章凯)。其中,章凯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无法适应当代管理研究,其有限的精华早已被西方成体系的理论所吸收,直接利用的价值不大<sup>[2]</sup>。李鑫则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不能为中

国本土管理研究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对于当代管理学研究只具有伦理的价值。由此,当吕力提出“总体来说,各位学者皆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对于现实的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是有助益的”的观点时,就有些“和稀泥”的味道了。

李鑫的《中国传统哲学与本土管理研究:讨论与反思》一文,与题目的立意稍有距离,实际上是对李平中国传统哲学诠释上的“全面”批判。与李平对中国传统哲学溢于纸面的激情一样,李鑫的批评也是“泼凉水”式的:“中庸:一个被神化的平衡概念;阴阳:一个朴素的辩证思想。”李鑫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并不适合于解决当今西方科学研究所面临的困惑,自然也不能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李鑫还认为,西方哲学的志趣在于求真——探索世界的客观真理,而中国哲学的志趣在于求善——即追寻天人合一的境界。鉴于此,“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在于形而上学的‘道论’,无论是道家的天道还是儒家的人道”。与黄光国的观感相近,或许也是李平行文中不留争辩空间的“强制性”,李鑫的批评令笔者较容易接受。以笔者对李平、李鑫2位学者的了解,《管理学报》发表这2篇文章的象征意义大于其实质内容。管理学者就学术问题公开、直接的交锋本来就应该是学术之道。

李鑫与李平两者间的学术分歧,在某种意义上,是围绕“中国传统(古代)哲学”争论在管理领域的翻版。笔者觉得管理学者讨论哲学问题,无论是中国传统哲学,还是西方哲学,最好能为爱好者提供某种“视域背景<sup>[1]</sup>”。这是因为哲学研究者对此类问题经过长期争论也从未达成共识<sup>[12,13]</sup>。

李鑫<sup>[14]</sup>在所撰的《X整合主义:一个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哲学》一文中似乎有所转向。他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是2套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必须创建一套与西方科学哲学相对应的本土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因此,提出了一个以西方哲学为参照,容纳中国传统哲学的6大核心理念“道、理、阴阳、悟、中庸及和谐”的称作X-整合主义的框架。但这种知识建构到底有多少“本土色彩”?这是因为大家似乎正在用一个标准的西方哲学视角来重新诠释中国传统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不该有“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这样的奇怪表述。

在李鑫的新建构中,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概念被分配为本体论:阴阳道理;认识论:思悟;方法论:中庸;价值论:和谐<sup>[14]</sup>。这与李平的看

法可谓相映成趣,即本体论:“道”;“认识论”:“阴阳平衡”;方法论:“悟”<sup>[3]</sup>。李平认为,“悟”不涉及具体的研究方法。但笔者确信仅仅有“悟”是无法满足对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深入探索的。

比较这2位学者的“三论建构”,笔者倾向于认为李平的想法更符合“三论”的约定。道可以作为对于客观实在性的一种指称(尽管道可道,非常道);而阴阳平衡可以引申并类比于“竞争性猜想”,这暗示可与研究对象形成关联的一种指导性原则,也包含与研究对象间关系的一种隐喻;悟可以被当作一种方法论(强调智慧而不是程序的首位性的方法论),同时也被当作一种方法。笔者设想“悟”可以发展出3种研究方法:①体悟,强调获得经验的直接性;②感悟,强调对于经验材料的诠释性;③顿悟,强调智慧对于经验的超越性。这样才有可能获得一种更加稳固、系统的构造。李鑫提出“阴阳道理”以为本体论的看法,与李平“道”主张比较相近,且他特别区分了“可道/不可道”的本体两面性。李鑫强调“和谐”以为价值论也容易接受。但笔者以为“思悟”更接近方法论而不是“认识论”,不涉及客体的“思悟”无从指涉认识论;至于中庸作为方法论?至少让笔者感到困惑。

成中英认为。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一方面,要看到“中国的管理哲学是以伦理为基础的。中国管理哲学在今天的中国具有一种理想的意义,中国人讲求和谐,强调德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要推己及人,……,世界大同,这是中国管理哲学的终极目标”;另一方面,“我们的管理学研究现在变得只是一味地向西方学习,丧失自己,就等于没有进展,或者只是重读古典,不知道其真正含义和现代意义”<sup>[15]</sup>。

对于人类合作这样的典型事务,成中英强调:“东西方的殊途同归是彼此学习之后的殊途同归,今后的竞争是彼此学习、再学习,西方人要向中国学习和谐的重要性,我们也要学习自由的重要性,我们要共同接受的是一种正义的重要性。”<sup>[15]</sup>举例来说,“在哲学领域当中,如何把正义和自由这2个基本的价值结合在一起,来共同实现人类的共同繁荣。这是中国管理哲学应该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最高的管理理想”<sup>[15]</sup>。

黄光国、李平、李鑫、吕力4位学者都对中国传统哲学(文化)进行了各自的诠释,在“中国传统哲学对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有所助益”上达成共识,他们的观点则分别可以归纳为“李平的

主导智慧说”，“黄光国的辅助说”，“李鑫的价值论说——X整合主义说”，“吕力的‘犹豫’说”。一场凝聚“中-欧-美，老-中-青”智慧的学术讨论借由《管理学报》成为“新知识景观”，相信会引发更多的讨论和争鸣。而笔者更期待，在那些善于从中国传统哲学挖掘宝藏的学者设法连接一条从中国传统哲学（在西方哲学的伴随下）通向自由和正义的康庄大道。

### 3 哲学何以在场

#### 3.1 始终在场的西方哲学以及启发性

哲学的目的在于质疑、反思、批判，就管理研究与哲学的关系，本来就是一种常识。长期以来，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所遭遇的“政治化”处理给哲学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哲学”在哲学以外常被当做“麻烦制造者”。中国管理学者长期远离哲学，远离质疑、反思和批判，也让管理学界深受其害。在2所中国大学的管理学院近20年的工作经历，笔者见惯了学者间因为缺乏系统的“文化<sup>[16]</sup>-范式-研究方法”知识而引发的歧视。只要学校以理工科为重，人文社科就遭到排斥；只要是管理科学与工程就看不起经验研究，只要是定量经验研究，就看不起质性研究，更不用说经验研究排斥理论（思辩）研究<sup>[6]</sup>。正是由于科学精神、科学素养的缺乏，才容易使“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符号性学术”泛滥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哲学在场”对管理研究，包括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意义是通过质疑、反思、批判，检讨研究者的预设（立场）、方法、成果和责任。具体而言，是帮助研究者进入管理实践场域，对事实、现象提出尽可能逼真地“观察、表征（再现）”，尽可能深刻地“诠释、洞见”，且始终保持着对“问题意识、知识生产过程、知识可靠性、研究者动机、信念”的批判性审查。哲学在场，在于扮演成中英所说的“一个批判者、一个监督者”<sup>[15]</sup>。

“哲学在场”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存在3种基本的关系，即只有西方哲学在场，只有中国传统哲学在场，两者共同在场。管理学者似乎很容易在“中-西哲学共同在场”上达成共识<sup>[1~4, 15]</sup>，却在如何“共同在场”上缺乏系统的思考，笔者推测在“共同在场”的表象下只有“主导性”更有意义。问题是尽管中国管理学界存在实证研究为主导的范式霸权和哲学的长期缺席，但西方管理学界的相关文献、著作可谓浩若烟海（如文献[17~20]）。从未缺失“在场的哲学”，从未远离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的持续反

思和批判。

回到这场讨论和这几篇文章的语境：“如何有效地开展中国本土管理研究（问题1），特别是关于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意义及内容（问题2）。”<sup>[3]</sup>显然，这2个问题在逻辑上的关联并不紧密。针对问题1，笔者不认为“必须创建一套与西方科学哲学相对应的本土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sup>[14]</sup>，而应该首先考虑就西方哲学的现状，仅以此为基础（黄光国语）——只有西方哲学在场是否已经足够？正如黄光国的研究经历——做转换范式-多元范式的尝试所蕴含的启发性，研究者不仅需要知道西方哲学的某些提法，还应当有相当程度的把握。只有认真梳理过西方管理学界的“哲学危机”和“解决之道”，才容易确立创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哲学（范式）”的必要和信心。

因为笔者长期思考管理本土化问题，也对西方哲学关注较多。希望简略地回顾并反思自己“哲学观”的形成过程，这是一连串“本土经验与西方哲学碰撞”的结果，也即笔者的“哲学观”完全是在西方语境中延展的（当然，也许有学者会从笔者的思想轨迹中洞察到中国传统哲学的显著影响）。

笔者曾经有过多年的管理咨询、营销策划经历，在攻读博士期间，对组织的相关思考有了更深层次的体悟。这种经历也让笔者注意到一个组织，包括组织的关键角色“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方式（组织文化）对于组织生存发展的意义，因此，决定做这方面的研究。谈及组织文化，必然要了解霍夫斯塔泰德的经典工作，但仔细阅读过他的论文、书籍后却产生了较大疑惑。笔者曾花了几个月时间寻找其他的组织文化研究线索，接触到沙因<sup>①</sup>、塞斯（Sathe）、塞克曼（Sackmann）等一批学者偏“诠释性”的经验、理论研究，了解到“民族志”、“现象学”等质性研究方法，不仅开阔了眼界，也似乎有了可以努力的方向<sup>[21]</sup>。

此后，笔者对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多元范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受导师席西民“问题导向”研究思想的影响，更关注如何“直面现实”，如何提升“现象-方法”的匹配性，如何在系统性基础上形成洞见。渐渐地，从“主客两分”转向“主体间性”<sup>[22]</sup>；从“多重现实”走进建构（诠释）主义<sup>[18]</sup>；虽然以自己的理论研究偏好，很喜欢现象学的“悬置”、“本质直观”<sup>[23]</sup>，但也接受强

① 笔者当年没有注意到国内学者的翻译，曾将沙因（Schein）译作“谢恩”。

调“机制挖掘”的后实证主义取向的批判现实主义<sup>[24]</sup>；近来则对“反身性/自反性”<sup>[25]</sup>有所领会。这些思考也转化成一系列与认识论、方法论有关的文章<sup>[5~7]</sup>。

多年来笔者最深切的感受是管理知识的生产，应该有多种竞争性途径，“范式”可以是研究的起点，却未必是学术的归宿。“哲学在场”并不是要维护什么，排斥什么，而是要不断地审视研究者的动机、态度、问题、方法、程序、结论的可靠性和应用价值。针对管理学或本土管理学研究，笔者以为“哲学在场”的当下意义是“拒绝科学主义，回归科学精神”。至于针对具体的经验和理论研究，“哲学在场”的启发在于要尽量接近事实，尽可能重构真相，无论处理的是常规数据还是文本、影像，无论是处理变量还是寻找机制，无论是提出猜想还是建构理论，真正的挑战一定是“智慧-洞见”。

### 3.2 中国传统哲学何以在场以及中国本土管理研究

#### 3.2.1 中国传统哲学何以在场

对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如果要引入中国传统哲学且以之为主导，某种程度上，一定意味着在场的西方哲学无法解决研究者面临的巨大困扰，这样才能够心安理得地处理“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意义及内容”，以及“如何有所助益”的问题。而到底有哪些困扰，需要“中国传统哲学在场”，乃至需要“根本变化的范式”？从西方哲学的视角出发，管理研究确实会受到“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影响，即“哲学必须在场”，从西方哲学的多元范式也衍生出了许多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策略。中国传统哲学除了“道-阴阳-悟/阴阳-思悟-中庸”拿来与三论比附以外，到底有哪些具体的研究方法、技术路径？即使“天人合一”在某种意义上具有鲜明的价值论“优越性”，是否也还要反思这种美好的期许为什么遭到历史的搁置？中国传统哲学在经历过无数的“诠释”后，是否该有进一步的深化？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系列美妙“词汇”所编织的画卷上，恐怕很容易让任何意欲深入进行经验研究的学人感到挫败。

笔者承认自己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大于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熟悉，所以笔者的质疑可能非常幼稚。但笔者从来拒绝给西方哲学笼统地贴上“二元分立”类似的标签然后将其作为靶子。这是因为笔者很难从“谱系”、“连续统”这样的概念/隐喻/范式中看到那么分明的“非此即彼”。笔者觉得“格式塔，系统性思想”也一定意味着

整体性。

#### 3.2.2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挑战

中国大陆管理学者对“本土化”后知后觉，可以先了解同为华人心理学者、社会学者已经走过的艰辛道路<sup>[8,26,27]</sup>。黄光国是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加入除了指点迷津，更可分享“苦苦追寻”后的经验和教训。当黄光国提倡“多重典范”，杨中芳“一直不想把本土化的研究方法定成是反‘实证主义’的，或是非用‘现象学’或‘诠释学’不可的。我还是认为本土化是可以容纳得下各种理论及方法的<sup>[27]</sup>”。当李平批评本土管理研究“缺乏与本土哲学的衔接，缺乏与西方哲学及理论的对话”，大陆的管理学者也并非无所觉察<sup>[7]</sup>。但这些反思主要都是学术层面的思考，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挑战何止于——哲学是否在场，何止于多元范式，主导范式？

一个更为基本却重要的问题是：管理学者从事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管理学者们是否真正形成了默顿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如果大家都只在为课题、论文、职称、学院、学校排名埋头苦干，追求一种“符号化学术”而不是韦伯所谓的“志业”，是否认真反思价值观、预设（立场）、研究态度、方法取向、成果可靠性以及对社会的贡献——哲学是否在场，又有多大的关系呢？比较而言，徐淑英的观察应该更加贴切，也更让人灰心：我们为发表而发表，我们缺乏科学精神、社会责任<sup>[28]</sup>。笔者曾经撰文批评过大陆管理学界风行的“实证研究”<sup>[5]</sup>，也试图从哲学反思中讨论适合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认识论<sup>[7]</sup>。但思考再三，如果学术已经被利益共同体各方异化为一种“共谋游戏”，无论郭重庆如何调侃“吃别人嚼过的馍<sup>[29]</sup>”；徐淑英如何批评“修修补补的研究<sup>[28]</sup>”，但就学术游戏的内在利益而言，只有“模型、统计”这类更具“形式美感”的主流方法，才便于批量地生产学者和学术成果——（大面积）学术建制化后职业化学者社群的一种生存策略，而且当看的论文越多，无论英文、中文，便越会发现这已经成为整个管理学界的通病。

“哲学在场”会澄清范式冲突的纷扰，会让“多重典范”成为常识。对于大陆管理学界，意味着“科学主义（哈耶克意义上的）去蔽”，意味着“科学精神（真诚、质疑、批判）”的倡导和回归。当管理学者更关注“问题意识”、“再现事实”、“内在机理”，以及“深刻洞见”的时候，无论他/她采取了什么样的范式或研究方法，实证主

义、后实证主义、诠释学、建构主义、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等。按照马奇所说的标准,只需要“tell (us) a good story”。

笔者主观地以为今天中国本土管理学界暂时没有“范式稀缺”的困惑,也不在于“建立在中国文化基础上的新范式”。如果国内管理学者们真诚接受徐淑英的批评,听从学术良知的召唤,以笔者当下的理解,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可行路线应该如下:①怎么接触到更真切的经验事实(人类学、民族志、社会学),更多利用容纳“历史性、社会化过程、情境复杂性、主体互动”的研究方法(如案例研究而非既定理论视角下的假设-检验);②怎么从这些经验素材中“提炼出核心的构念”——扎根、归纳的研究方法;③如何挖掘机制(运行机理、文化模式)而非满足于展现表面化的变量关系——批判现实主义的认识论;④对中国当代管理实践的伦理反思。具体到经验研究,中国管理研究者面临的挑战应该是——能不能接触事实,能不能“自由”表达;其次,有了事实有没有能力有新奇的发现(构念和机制)。而且,无论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哪怕是更归纳的扎根理论,更情境化的案例研究,发现的要诀只能是智慧而不可能是任何程序和技术。如果这种“智慧”就是李平所推崇的“悟”,笔者的看法是很多研究者缺乏这样的“悟性”——它不是什么范式、理论视角、研究方法,而是洞见的匮乏。

黄光国希望“在研究生养成教育过程中,如果能够用半年的功夫,有系统地消化吸收(科学哲学),那么将来在做研究时,便可能以之作为“背景视域<sup>[1]</sup>”。但光有“背景视域”是不够的。近几年与西安交大管理学院一群勤奋聪明的博士研究生的合作研究经历让笔者更加明白:管理学院必须大幅改进研究生的培养方式,要让未来的研究者更多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中国人的“社会化过程”。作为研究者,除了掌握那些重要的研究方法以外,要有更宽阔的视野,更丰富的人生阅历、组织经验,以及对现象敏锐的洞察力——涌现性的“直觉-想象-悟性-本质直观”。中国本土管理研究需要曹锦清<sup>[30]</sup>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所提及的那种扎实、艰苦的研究;更需要费孝通提出“差序格局”的智慧!

#### 4 结语:文化认同与话语权之争

中国传统到底是什么?学者可以无限地诠释-建构。但只有在中国人的生活史,特别是当下生活中才能找到更加可靠的依据。不然,如

果有人坚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核心价值是“实用主义”,而“好死不如赖活着”才是我们的最高信仰,靠“注来注去”的文本、修辞,我们能从容应对吗?杨中芳<sup>[27]</sup>曾就如何深化本土心理学研究提出2个标准:①是否是扎根的,亦即是否是在中国“文化/社会/历史”脉络中找出中国人现代生活所表现的行为背后的深层意义(亦即心理运作);②是否是有系统的,亦即在寻求理解中国人的行为时,是否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释义体系,用之可以较全面的来描述或理解中国人的行为。其中第1条尤其洞见性,即人们固然离不开文化、历史、社会、传统哲学的多维视角,但更需从“中国人的现代生活”入手,非如此,则难有机会与中国管理实践者深层次的文化模式(社会心理)做紧密的关联,也难以建构起真正具有解释力、“预见性”和积极的社会干预力的理论贡献。

笔者赞赏李平等学者对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热爱和挖掘,但如果过分推崇,难免会被自己编织的“大智大慧”所遮蔽。波尔或许对“阴阳”有几分好奇和赞许,但笔者推测一个只懂“阴阳”却从未受过物理学训练的“智者”,永远也不会明白什么是微观世界的互补原理。一边是“知识验证”,所以有“牛顿的三大定律,牛顿-莱布尼茨的微积分,达尔文的进化论,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沃森和克里克双螺旋结构,……”;另一边是“知识创造”,所以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不执迷,超脱;致虚极,求静笃?”

笔者尽量揣摩了“道”、“阴阳”、“悟”、“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可能存在的精妙。粗浅的感受是,要么先人们太过伟大,不屑留给后代一张抵达彼岸的路线图,使后辈无法掌握实践这些“伟大愿景-终极目标”的方法;要么先人们太善于修辞,尽管留下了无数华丽的思想片段,却几乎无意于打开这扇神秘之门(笔者承认李约瑟的杰出贡献在把“科学与技术、工艺”不详加区分的意义上<sup>[13]</sup>修正了笔者的部分偏见)。极而言之,就是在最受推崇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应该承认不同文明都有过类似的智慧)”的智慧普照下,恰恰在中国,从来没有从学理上,更不用说实践上找到从箴言建立一个文明、自由、正义、法治社会的技术路线。尊重先贤,就请把他们放在恰当的位置上,即使先人曾经领先过世界2000年,也必须承认在近代科学、技术、文化飞速发展的几百年间中国远远地落后了。承认落后并不尴尬,没有人也没有那么容

易光靠从先祖处就突然找到了荣耀。只要相信自己，只要努力前行！

回到管理世界，对于身处学术“边陲”<sup>[26]</sup>的中国管理学者，想在“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开展一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运动既值得肯定，也让人鼓舞。但对于如何开展本土管理研究，却不能只从信念出发，因为“中国文化传统资源丰富”，就一定能为本土管理研究所用。今天面临种种困扰的我们，很大程度上，不正是从那个多重面向的传统中走出来的吗？本土管理研究者完全可以采用一种更开放、更积极的姿态，把一个广谱的，充满争议、反思和启发的西方哲学先拿来为我所用！同时，当本土管理学者开始憧憬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繁荣时，也有必要意识到：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自信和荣耀，不是源于学者们在国际发表记录上“超英赶美”，在引用率上位列前茅。归根到底，是管理研究者的知识贡献，让千千万万的中国管理实践者——领导、管理者、下属，或者更加平等的命运共同体成员从事于有格调、有秩序、有创造，让这个社会更加美好的组织生活。

#### 参 考 文 献

- [1] 黄光国. “主/客对立”与“天人合一”: 管理研究中的后现代智慧[J]. 管理学报, 2013, 10(7): 937~948
- [2] 吕力. 易学管理理论与管理学中国学派: 基于管理与环境的视角[J]. 管理学报, 2013, 10(8): 1100~1109
- [3] 李平.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与中国传统哲学[J]. 管理学报, 2013, 10(9): 1249~1261
- [4] 李鑫. 中国传统哲学与本土管理研究: 讨论与反思[J]. 管理学报, 2013, 10(10): 1425~1433
- [5] 韩巍. 论实证研究神塔的倒掉[J]. 管理学报, 2011, 8(7): 980~989
- [6] 韩巍. 管理学界应该接纳思辨研究[J]. 管理学家: 学术版, 2011, 4(7): 23~36
- [7] 韩巍. 管理研究认识论的探索: 基于“管理学在中国”专题论文的梳理及反思[J]. 管理学报, 2011, 8(12): 1772~1781
- [8] 黄光国. 社会科学的理路[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 [9] 黄光国. 儒家关系主义[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10] 陈晓萍, 徐淑英, 樊景立. 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11] 席西民, 韩巍. 中国管理学界的困境和出路: 本土化领导研究思考的启示[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30(2): 32~40
- [12] 朱亚宗. 阴阳思维模式与中国古代科学[J]. 科学技

术与辩证法, 1992, 9(4): 41~45

- [13] 陈炎. 儒家与道家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制约: 兼答“李约瑟难题”[J].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24(1): 116~126
- [14] 李鑫. X 整合主义: 一个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哲学[D]. 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商学院, 2014
- [15] 成中英, 吕力. 成中英教授论管理哲学的概念、体系、结构与中国管理哲学[J]. 管理学报, 2012, 9(8): 1099~1110
- [16] 斯诺 C P. 两种文化[M]. 纪树立, 译. 北京: 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4
- [17] MORGAN G. Paradigms, Metaphors, and Puzzle Solving in Organization Theory[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80, 25(4): 605~626
- [18] 纽曼 L. 社会研究方法: 定性和定量的取向[M]. 郝大海,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19] 邓津 N K, 林肯 Y S. 定性研究(1~4)[M]. 风笑天,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7
- [20] 埃尔弗森 M.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研究[M]. 甘会斌,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 [21] 韩巍. 基于文化的企业及企业集团管理行为研究[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3
- [22] 吉登斯 A.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M]. 田佑中, 刘江涛,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3
- [23] 胡塞尔 E. 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 张庆雄,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 [24] TSOUKAS H. What is Management? An Outline of a Metatheory[J].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89, 5(4): 289~301.
- [25] ALVESSON M, SKOLDBERG K. Reflexive Methodology[M]. 2nd edition. London: Sage, 2009
- [26] 叶启政. 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27] 杨中芳. 如何研究中国人: 心理学研究本土化论文集[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
- [28] TSUI A S. The Spirit of Science and Socially Responsible Scholarship [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09, 9(3): 375~394
- [29] 郭重庆. 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J]. 管理学报, 2008, 5(3): 320~322.
- [30] 曹锦清. 黄河边的中国[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

(编辑 郭恺)

作者简介: 韩巍 (1969~), 男, 陕西西安人。深圳大学 (广东省深圳市 518060) 管理学院副教授, 博士。研究方向为本土化管理、研究方法论及和谐管理理论。E-mail: hanwei69223@163.com